



百家文库

BAIJIA WENKU

文化激进主义语境中的 现代中国文学

WENHUA JIJIN ZHUYI YUJING ZHONG DE
XIANDAI ZHONGGUO WENXUE

岳凯华 卢付林 著



YZL0890146101

湖南大学出版社

文化激进主义语境中的现代中国文学

岳凯华 卢付林 著



YZLI0890146101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立足于现代中国思想语境,解读文化激进主义在晚清、五四时期、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和十七年时期等历史时段的具体特质,审视现代中国文学之审美观念、文学思潮、文学派别、文体样式的现代性变迁特征,挖掘清末文学改良、五四文学革命、三十年代文学、四十年代文学和十七年文学得以生成的复杂动因,揭示现代中国文学转型和嬗变的内在规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激进主义语境中的现代中国文学/岳凯华,卢付林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667-0087-2

I. ①文… II. ①岳… ②卢…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6146号

文化激进主义语境中的现代中国文学

Wenhua Jijin Zhuyi Yujing zhong de Xiandai Zhongguo Wenxue

作 者:岳凯华 卢付林 著

责任编辑:王桂贞

责任校对:祝世英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印制:陈 燕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822559(发行部),88821343(编辑室),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8649312(发行部),88822264(总编室)

电子邮箱:wanguia@126.com

网 址: <http://www.hnupress.com>

印 装:长沙国防科大印刷厂

开本:710×1000 16开

印张:14.75

字数:257千

版次:2011年12月第1版

印次: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67-0087-2/I·64

定价:36.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 次

引 言	(1)
-----	-------

第一章 晚清文学：新民思想规约的文体革命

第一节 新民思想与革命心态	(12)
一、新民思想的规约	(12)
二、革命心态的萌发	(16)
第二节 “三界”革命的开展	(24)
一、诗界革命的动因	(26)
二、文界革命的起点	(36)
三、小说界革命的缘由	(43)

第二章 五四文学：民主浪潮引发的民间趋向

第一节 横空出世：文化激进主义与新文学的倡导	(52)
一、革命策略：断裂与渐进的交融	(53)
二、革命路径：从“活的文学”到“人的文学”	(62)
第二节 走向民间：民主精神制约的文学走向	(86)
一、文体观念的民众化	(86)
二、人物形象的大众化	(100)

第三章 三十年代文学：阶级意识激发的左翼浪潮

第一节 左翼文学思想的罗曼蒂克	(110)
一、革命文学的锋芒毕露	(110)
二、左联纲领的激情喷发	(116)
第二节 “文化围剿”重围中的中流砥柱	(121)
一、立场的分野：对右翼文学思潮的清算	(121)

二、错位的对话：与自由主义文人的冲突·····	(130)
第四章 四十年代文学：民族战争潮流中的文学选择	
第一节 战国策派：民族主义情绪掀起的狂飙·····	(142)
一、民族意识的张扬与个人主义的抑制·····	(142)
二、英雄崇拜的狂热和传统文化的贬损·····	(150)
第二节 延安文学：工农兵方向规范的文学选择·····	(159)
一、启蒙主体的置换·····	(160)
二、大众品格的追求·····	(169)
第五章 十七年文学：毛泽东文艺思想语境中的文学论争	
第一节 鸣放期的鸣放：对教条主义思想的抗辩·····	(181)
一、双百方针：抗辩教条主义思想的时机·····	(181)
二、鸣放：对教条主义思想的清理·····	(187)
第二节 “一”与“多”的辩驳：关于题材、人物及风格·····	(201)
一、关于题材的辩驳·····	(201)
二、关于人物的辩驳·····	(208)
三、关于风格的辩驳·····	(216)
参考文献·····	(220)

引言

20 世纪的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繁，启蒙和救亡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西学东进，中西交融，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纷纷涌入国门，既影响中国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制约中国文化、文学的流变，尤其是激进主义思潮对现代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咀嚼、回味与深思。

“激进”（radical）一词似乎人所皆知，然而中国人常用的大型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并未对“激进”词条予以具体解释，《辞海》则干脆不列这个词条，不过前者对“激进”一词的同义词“急进”给予了较详细的解说：“急于改革和进取。”^① 其实，“激进”与“急进”二者在当今学界的视野中是同一的，《现代汉语词典》就将二者并置^②，人们在习惯上更乐于使用前者。学界人士指出：“‘激进’一词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可能有一定的程式、标准或量化处理方法。它只是相对于保守、缓进、温和态度而言的行事规则。”^③ 一般而言，“激进”指的就是急剧改变现存事物的言论或行动，它只是一个中性概念，并无当下人们对待“激进”态度所包含的褒贬情感内涵。“激进主义”，英文写作“radicalism”，乃学界近年自西方引进的一个批评术语，它是相对于保守主义（conservatism）、自由主义（liberalism）而言的。近年人们使用“激进主义”概念，各人所指的内涵不尽相同，譬如把它作为党派来划分，譬如把它简单地等同于“暴力革命”，譬如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同文化大革命相联系，但大多没有对该概念做出严格的界定和规约。其实，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已经有人意识到了它的难度和复杂。复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529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517 页。

③ 张宝明：《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学林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 页。

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义华在与人对话时就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他说：“从学理上讲就是相当复杂的，而具体到中国近百年的社会实践中，所涉及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① 本书以为，“激进主义”通常指在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时代或社会里以“矫枉过正”的言行改变现存秩序里任何一个领域状况的态度（disposition）或倾向（orientation）。激进主义在中国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这也是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② 激进主义在 20 世纪的中国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激进主义矫枉过正的文化选择，是对传统、现实的叛逆和抗争，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也是特殊时期中国社会现代化启动的某种策略性表现，对它不能采取抹杀和否认的态度。萌生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大体包括文化激进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二者的一致，在于彼此的激进倾向或激进态度大致相同。二者的区分，在于前者着眼于文化层面，针对传统文化，主张全盘推翻和批判；后者着眼于政治层面，针对现实政治秩序，要求根本解决和重建。总的来看，中国近代以来激进主义生成与发展的阶段性非常明显。不过这种划分只着眼于激进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罢了，很难给它一个泾渭分明的边界，因为文化与政治是水乳交融的，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20 世纪初，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明的碰撞和交流，产生了耀眼的思想火花。自异域文明寻求救国良策，成了近代激进的先觉者自觉的文化选择。从“器物”到“制度”的屡试屡败，使得先觉者的目光自然转向了思想的启蒙，从而在文化问题上有许多相当激进的主张和观念。作为晚清最初的文化变革范式、开启于洋务时代的“中体西用”思潮，在“器”、“用”层面倡导西学，酝酿和张扬西方科技、经济、政教和军事的学习，这在洋务运动后期几乎达成了共识。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就要求“总揽政教之权衡，博采泰西之技艺”，“诚使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益，

① 姜义华、陈炎：《激进与保守：一段尚未结束的对话》，《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震荡》，李世涛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 页。

② 譬如引发激进主义反思浪潮的海外学者余英时教授 1988 年 9 月在香港中文大学 25 周年纪念的第四次讲座上指出：“我所说的激进、保守并不是说哪一套思想，也不是指某一特定的学派。我们讲保守，并不是指儒家；我们讲激进，也不是讲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所谓的左派的、激进的思想。我指的是一种态度，英文叫 disposition，一种倾向，或者是一种 orientation。”（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震荡》，李世涛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 页）虽然余英时先生的看法在这一基点上不断游移，尤其是将新文化运动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并视其为激进主义的恶性发展，引起了内地许多学者的批评，但激进主义是一种态度或一种倾向的观点，对撰写本书颇有启发。

精理农商，藉植富国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①而张之洞的《劝学篇》也强调“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要求“讲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艺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而所谓“西艺”，举凡“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诸端均是也；所谓“西政”，则当推“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②由此可见，洋务派已开始从“西艺”层面深入到“西政”层面。“西学”的提倡，与“三代圣人之法”之间存在着巨大冲突，这意味着传统儒学的文化霸权地位在西学东渐态势下的逐渐丧失。显然，洋务时代的“中体西用”思潮的演变，“西学”与“中体”范畴之间的伸缩消长，实质上为中国传统文化衰微之走向与格局之变化的预兆。随着“西用”范畴由技艺向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侵蚀和扩充，“中体”范畴虽负隅顽抗，也日益缩小为孔教之道统。在这种文化语境中，洋务派寄希望于“取西人器数之学”，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③“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④由此可见，洋务派倡导的“中体西用”思潮已经在道统层面上裹足不前，其激进文化范式日益显露了自身的限度与矛盾。它不仅无法成为导引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文化观念，而且“无法构成一种严整的新型的文化观念体系”。^⑤如果冷静地分析，洋务派根本没有主动地顾及文学的变革，虽然冯桂芬、郑观应、薛福成等人的报章文开始扫除“时文”的陈词滥调和摆脱桐城派的散文章法。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启动，迫切需要创造一种既吻合时代进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化观。作为维新思潮的弄潮儿，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在甲午战争后，承继洋务派激进思潮之余绪，迅速掀起了一场以救亡保国为宗旨的维新变法运动。维新派虽然在文化价值变革的道路上迈出了真正的一步，达尔文的进化论、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密尔的自由主义、孟德斯鸠的法学、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法国的革命思想等西方社会各种政治学说的译介、介绍和传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国人对儒学意义

① 郑观应：《道器》，《盛世危言》，辛俊玲评注，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② 张之洞：《设学第三》，《劝学篇》，李凤仙评注，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③ 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薛福成选集》，丁凤麟、王欣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6页。

④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上册，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中国近代史组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4页。

⑤ 丁伟志、陈崧：《中体西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

秩序的怀疑、批判和叛离，深化了中国价值符号系统的危机，但并不能就此掩盖其价值取向上与传统文化“貌离神合”的复古态势。如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虽然以西方的马丁·路德自居，但他仍然以孔学为精神资源和文化支撑来行其变法，不仅“托古改制”，而且“拉大旗作虎皮”，企图依靠皇帝实行自上而下的温和的政治改良。维新派的改革热情和献身精神诚然可贵，但其变革路径不能不说是幼稚而粗糙的。从总体上看，维新派在文化思想观念上虽然引发了举国上下人心大潮的涌动，但其实质仍然是停留在政治现代化的层面，意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制度的变革，借鉴西方模式，走资本主义道路以救亡图强。不过，在遭受巨创之后，维新派以激进的态度催促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萌芽和诞生，虽然也从戊戌前的黄遵宪诗歌中得益，但大张旗鼓地张扬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的旗帜，提倡白话，译介西洋文学，极力夸大文学的社会功用，强调为政治服务，为“新民”服务，一股新的文学潮流应运而生，并直接导引和催化出五四文学的兴起和壮观。

20世纪初的中国真正进入了亘古未有的大变局时代。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采用武装斗争、暴力革命、流血牺牲的激进方式实现民主共和，形成了近代历史上政治激进主义的大本营，破天荒酿造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高潮。在文化问题上，如果说孙中山坚持保存国粹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是为了以文化认同来动员民众进行反满的民族革命，那么革命派中的急先锋邹容、陈天华、章太炎并没有因为政治的激进倾向而影响自己的文化批判主张，尤其是章太炎激进的“钉孔”主张影响颇为深远。不过，革命派在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上却显得相当温和。即使反孔批儒最为激烈的章太炎，他的文化倾向总体上也受制于国粹主义，仍然高度赞扬孔子保存、光大中国文化传统的丰功伟绩，更不用说宗教观念素来薄弱的陈天华辞世前的遗愿了，他临终前居然认为“如谓宗教必不可无，则毋宁仍尊孔教”或“兼奉佛教”。^①但革命作家的政治意识是相当分明的，其作品的共同主题是强调“排满革命”的正义性和迫切性，主张通过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而建立民主共和的中国。如冷清女史《洗耻记》中“杀尽胡儿复祖邦，一杯血酒洒天荒”之类的歌曲，流露出了鲜明的“种族革命”立场；自由花的《自由结婚》第一回“老夫伤怀故国，对景生悲，恨不得把那些狗奴才铲除净尽，使我国民

^① 陈天华：《绝命辞》，《陈天华集》，刘晴波、彭国兴编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8页。

个个雄赳赳，将来建立自由的国家组织、共和的政府……成为世界第一流强国”的叙述，简直就是“对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的纲领的演绎”^①；而羽衣女士的《东欧女豪杰》断然否定中国社会，激烈主张“用破坏手段，把从来专制一切打破”；陈天华的《狮子吼》阐发“国民意识”，认为“倘若做皇帝的，做官府的，实于国家不利，做百姓的即要行那国民的权利，把那皇帝官府杀了，另建一个好好的政府，这才算尽了国民的责任”。

20世纪初，从西方、日本输入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在政治、文化层面扮演了最为激进的角色，可以说是“集政治激进与文化激进于一体”^②的中国激进主义流派。无政府主义崇敬无祖父、无政府、无国家、无军队、无法律、无尊卑、无家庭、无种界的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从“政府者万恶之源”的判断出发，运用极端的革命言辞，采取斩草除根的无情手段，主张“社会革命始为完全之革命，即平尊卑也，均贫富也，一言以毕之，使大众享平等幸福，去一切不公之事”^③，指斥资本主义政府乃“外托伪道德之名，内视公理若刍狗，对于弱者，则为自立之政府，对于强者，则为势利之政府，横行强权，贱视弱种，于民生之休戚，置若罔闻”^④，认为君主立宪之国、民主立宪之国实际上都是显贵殷实之徒操持的与贫民为敌的万恶之源、“病民之根”，“贫民永沦于奴隶，富者益智，贫者益愚，因智而贵，因愚而贱”^⑤，从而彻底否定资本主义文明，反对中国进行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革命。在反传统文化的层面上，如果说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底线尚停留在“抑孔”基点的话，那么无政府主义则公开扬起了“排孔”的鲜艳旗帜，摆出了一幅惊世骇俗的“擒贼先擒王”的彻底文化革命的激进姿态。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聚集在巴黎的《新世纪》周围，该刊流露出了露骨的文化虚无主义色彩，1908年刊发的《排孔证言》可谓近代以来全面提出反孔革命口号的文章，它宣称：“支那者，政教混合之国也，亦恐惧，亦迷信，故至今日始梦呓立宪。为此厉阶者，非孔丘乎！孔丘之为宗教家否，吾不过问。惟自

① 朱文华：《中国近代文学潮流——从戊戌前后到五四文学革命》，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

② 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页。

③ 真民：《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张枏、王忍之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999页。

④ 《政府者万恶之源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张枏、王忍之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914页。

⑤ 申叔：《论新政为病民之本》，《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张枏、王忍之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968～969页。

政府之所利用、人民之所迷信之一方面观之，虽喙长三尺者，能辨其无宗教之现象乎？呜呼，孔丘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今又凭依其大祀之牌位，以与同胞酬酢。立宪党之如何舞蹈，吾不能知。独怪热心革命者，或发扬周秦诸子，或排斥宋元诸人，而于孔丘则不一注意。夫大祀牌位一日不入火刹，政治革命一日不克奏功，更何问男女革命，更何问无政府革命。擒贼先擒王，不之知，抑毋亦有所迷信乎！吾请正告曰：欲世界人进于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①虽然无政府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锐利抨击不无合理的成分，其痛恨现实的激愤情绪、孤注一掷的狂热心理、一步登天的政治幻想，也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但成为了专门以旁敲侧击、冷嘲热讽的方式与革命派唱反调的“革革命派”，对近代仁人志士救亡图强的奋斗业绩的否定也走向了极端，所以不少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它“在理论上的空想性质和实践上的破坏性质”^②，它“所喧嚣的‘破坏论’除了给现实中国提供一把破坏旧世界的大刀板斧外，不可能成为建设新世界的有力杠杆。这一理论缺陷使它难以在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发挥建设性的历史作用，这大概是‘五四’以后无政府主义逐渐失势的一个重要原因”^③。然而，这样一个激进的组织在文学上却没有多大作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流文明的普世性受到了怀疑，先觉者的目光投向了民主、科学等新兴的西方文明，中国社会向何处去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各种思潮之间互相颉颃、互相补充，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激进主义思潮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乃至文学的影响依然占据了主导地位。1915年9月，陈独秀于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更名为《新青年》），一场聚焦于传统伦理纲常层面的“价值重估”运动得以出场，新文化运动由此开端。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广延新学人才。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移居京师，北京大学出现新的转机，当今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人物出场、一个组织转型、一个杂志创办”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在上述三种要素构成的文化情境中，一批崇尚民主、科学、自由的知识分子诸如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

① 绝圣：《排孔证言》，《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张枏、王忍之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08页。

② 丁伟志、陈崧：《中体西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1页。

③ 欧阳哲生：《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

作人等得以迅速集结和联手，进而掀起和倡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文化批判为主调的激进的现代思想启蒙运动。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自由时代，也是一个文化批判的激进时代。五四激进文人围绕着中西文化、孔教、民主、科学、爱情、婚姻等诸多问题的讨论和比较，提倡自由主义和个性解放、“德先生”和“赛先生”、“劳工神圣”等口号一时流行在知识界，并被其他阶层广泛接受，“到民间去”成了当时知识分子追求的神圣目标，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运动，以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价值观为武器，批判儒学意识形态，改造国民性，创造新文学，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寻找和提供了新鲜的思想资源和文化支撑。

“言文一致”的语言变革刺激了觉悟的五四激进文人，五四文学革命继承晚清以降文学变革的思想资源，赋予作品思想教化功能，文学的功利价值取向相当明显，但作家的创作是一种自觉的认同，没有外力的强制。胡适的文学改良策略，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观念，鲁迅的“听将令”，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都是他们自觉的选择。他们反对“载封建之道”，倡导启蒙价值。一代知识精英把思想启蒙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反对封建思想，抨击复古逆流，批判传统文学。他们对代表传统文化的旧文学主动出击，抨击黑幕派和鸳鸯蝴蝶派，揭露他们小说的麻醉作用，认为只有国民的精神解放才能求得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为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和新文学创作扫清了障碍，为新文学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四大潮的推动下，坚持用启蒙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及态度观照文学问题，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片辉煌的新天地。废文言而兴白话，关注民生，体察民情，选取下层民众题材，表现平民生活，成为激进作家的自觉选择。虽有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林琴南和以吴宓、梅光迪、胡先骕为代表的“学衡派”从文化积累和学理建设的角度对新文学矫枉过正，但他们保守的文化主张在激进的新文化话语打压下失去了反抗力量。

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激进主义思潮并没有形成一统的局面，多元的文化选择形成了相对宽容的文化氛围。不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李大钊首开中国马克思主义之先河，陈独秀由讴歌西方民主主义转向俄国的社会主义新文明，这预示着五四激进主义由文化启蒙向政治转变的新趋势。五四运动爆发、《新青年》杂志南下、新文化统一战线阵营分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60页。

化之后，中国的激进主义进入了以开创社会主义道路为旨归的政治激进主义时期，文学革命的团队发生了分化。新文学阵营毕竟成分复杂，追求各异，在时代大潮中当了一回弄潮儿之后，又按照各自的想法发展自己。激进文人的主干异变为新兴政党的魁首直接从事社会革命，吴虞“渐入颓唐”难以自拔，刘半农、傅斯年等远走异国他乡提升学历，钱玄同、周作人等踱进象牙之塔、退回书斋、折入学人研究学理之途，鲁迅则不知前路在哪而“荷戟独彷徨”。总之，众多的五四激进文人其后大抵安于文教一隅，不再有当年指点江山的书生意气。不过，经过短暂沉寂之后的新文学又以新的面目出现了。

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李达、瞿秋白等一批在五四思潮洗礼下成长的新青年，先后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政治文化激进主义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上开始如日中天。当时的政党政治、阶级意识开始成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政治激进主义思潮不但对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文学发展也产生了重要作用，文学与政治的结缘也于20世纪20年代滥觞。中国共产党人关注新文学始于1923年，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沈泽民、蒋光慈等人就曾著文，提出过无产阶级文学主张，引导新文学的发展方向。1924年，出现了有明显革命倾向的文学社团——春雷社；1925年“五卅”运动后，沈雁冰等人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文学现象，他们不满“不问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学，主张以“文学为工具”，这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先声。这种思潮以苏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日本“福本主义”和“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文学运动为指针，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文学批评的方法，将文学直接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激进的文艺思潮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相当深远。

1928年，由创造社、太阳社发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继承了苏联和日本左翼文学理论，最具文化激进主义的特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表现出一种浪漫激情的蒋光慈、郭沫若、成仿吾等革命作家纷纷撰文，强调知识分子的政治角色和个人价值取向的消除，将个体纳入到权力机器上，重视权力和暴力，认为文学是生活意志的表现、是政治武器，甚至把文学当成了革命的“炼金术”，把文学变成了“文艺暴动”。文学和政治暴动已无法区分，文学家变成了职业革命家，文学和生活的距离消失了，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宣传性，忽视文学的审美性和真实性，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持否定立场，对西方现代文明持怀疑态度，并从新的角度以激进的方式清算、剖析与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判定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提出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认为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初

期的作品已经丧失了时代意义，希望以文化重建的方式建立新的文化理性秩序，并提出“无产阶级的五四”等口号，甚至连瞿秋白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持全盘否定态度，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失败，“五四是过去的了”。^①显然，他们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缺乏深刻的认识。

国民党政权则推行党化教育，对革命文学运动采取了一系列对策与之抗衡。1929年，国民党召开“全国宣传会议”，提出以“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来清理统一文坛，企图扼杀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在上海，国民党主办的《民国日报》公开宣言打倒“革命文学”和“阶级文学”，提出建设三民主义文学，后来变成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提出“统一于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其实质是统一于一种思想、一种主义，把文学当成赤裸裸的政治工具。尽管国民党掌握着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资源，但在文艺领域没有出色的作为，反而被左翼文学的声势压倒，形成了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文艺思潮相互对立的局面。以“左联”为核心的激进主义，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当时的普罗作家把幼稚的政治观念当成了一种强制的理论教条，将革命文学规定为“煽动艺术”，强调革命文学不能描写黑暗、挫折和失败，只能去描写光明的前途。他们毫不讳言，甚至公开宣称他们所写的是广告式的标语口号文学。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学直接称为“新兴文学”，是文学上的最新发展和最高进化阶段。这种理论与实践影响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命运，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以朱光潜、沈从文、林语堂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没有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与社会隔绝，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思考人生，继承五四新文学启蒙思想，坚持启蒙的文学主张，重视个性自由，坚持文学的独立价值，不接受文艺成为工具的提法，文学的价值取向迥异于左翼和右翼的文学理论主张，与激进的意识形态保持一种距离，但并不完全排斥文学的功利性和社会价值。作为“自由人”的胡秋原、苏汶，对左翼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文学作为被压迫阶级的武器，为争取阶级解放、民族独立，有它历史的、理性的一面，但要把各种文学现象都网罗，让作家必须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显然是不可取的。由于其政治理念和文学观念比较激进，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作家的创造力，抑制了作家对艺术本体探求的欲望。“左联”同当时的主体政治文化——右翼文学展开了激烈斗争，也与自由派在“阶级性”和“人性”、文艺和政治、真实性和党派等焦点上展开激烈论争，剑拔

^① 易嘉：《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载《北斗》1932年5月20日第2卷第2期。

弩张，火药味十足。左翼依靠强大的组织资源，与其他流派的文艺论争，往往以绝对的优势压倒对方。实际上，他们在各自的环境中，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都有意气用事的地方。囿于时代的认识，这种争论延续了四五十年，影响了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与实践。但是，由此 20 世纪 30 年代的激进主义思潮对文学的影响更深入了，各种文学思潮造成的激烈碰撞、互相交流反而使文坛一度出现了繁荣景象。

由于外敌的入侵，民族战争的烽火点燃了，战争使中国形成了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和“孤岛”等不同的政治区域，现代文人自觉肩负起了民族救亡的使命，五四时代形成的相对自由的思想氛围渐趋消失，思想启蒙的主题也相应调整为宣传抗战、号召人民为国赴难，20 世纪 40 年代文学在题材选择、风格形成及审美心理方面呈现出了不同的表现方式和发展格局。解放区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了现代中国实现社会整合、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从思想上与组织上自觉地构建党的意识形态，文学成为了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成为当时及其后中国共产党制定文艺政策、指导文艺运动的根本方针。毛泽东指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① 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要求作家自觉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服从于战争和“工农兵”的需要，解放区文学朝着通俗化方向发展。国统区的国民党在文化方面也强调党化主张，号召兴国学、建国文学，反对祸国文学。战时策派作家提出了激进的文学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文学观鼓噪一时，但由于各种原因当时即遭到了各方面的批判。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在毛泽东文艺思想语境之中，中国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到文学论争的热潮之中，对教条主义思想展开批判，就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给予质疑，在人性、人道主义、题材、人物及风格等层面反复争鸣，在文坛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批判运动，其中有不少过错、缺失、遗憾乃至冤案，但对当时新政权的稳固和发展提供了文学层面的合法性论证。

纵观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激进主义占据了主导的强势地位，受其影响的现代中国文学就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激进主义氛围中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822 页。

第一章

晚清文学：新民思想规约的文体革命

金耀基指出，现代中国的巨变是因 19 世纪末叶西方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轰击而开始的，但“坚船利炮所代表者不是科学技术，而是帝国主义、侵略主义。故而西方之‘陌生的技术’在当时中国人眼中不是价值中性的，它代表一种邪恶与威胁”。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在西方‘兵临天下’，人为刀俎，我俟鱼肉的劣势下被逼而起的自强运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受最大的屈辱，过去一百年，即中国的‘屈辱的世纪’。天朝之败于‘西夷’，是一屈辱；一败再败，则是大屈辱；败于西夷，而又必须学于西夷，更是屈辱之至。故而，中国百年来之现代化运动，实是一雪耻图强的运动”，而追求现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过去一世纪当中，一直在“认同的危机”中奋斗，“第一流的深具卓见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放弃对一个新的理想的认同的追求”。^① 实际上，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社会与历史即融入了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但是西方现代性的冲击破坏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结构的联系方式，在融入现代化潮流的过程中，其内心有着无法克服的特殊的文化心理障碍，具体表现为士人阶层对国家、社会、文化产生了认同危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变革”诉求与维护传统文化的“认同”诉求之间出现了紧张和裂缝。陶东风认为，现代性在中国的实现，“一方面要求建立主权民族国家，但另一方面又呼唤文化启蒙，即用‘西方的智慧’（从技术、政体到文化价值，它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为所谓‘科学’与‘民主’）开启国民的蒙昧；然而这个西方‘老师’不但在文化系统、价值观念上与中国传统相去甚远，而且事实上还是‘三座大山’之首的帝国主义，是直接导致中国从

^① 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台湾时报出版公司 1991 年版，第 20～33 页。

‘天朝’中心大国跌入半封建、半殖民地边缘的民族大敌。由此，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自近代以来就陷入了极其深刻的，几乎是无法解脱的认同危机中”。^①从某种意义上说，晚清文学革命正是这批追求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激进的维新人士在巨大而深刻的认同危机语境中，以促进传统中国文学变革的方式来摆脱民族屈辱、图谋政治革新而掀起的一股浪潮。

第一节 新民思想与革命心态

一、新民思想的规约

近代中国，人的发现及“新民思想”的提出，是社会演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由器物层面向制度、思想、文化层面合乎逻辑的深入发展。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封建社会急剧解体，开始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年代。在这样一个“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莫气，与梦为邻”^②的沉闷而窒息的社会里，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逐渐在世界文化的语境中，反思传统中国文化的弊端，寻求社会、文化、思想变革的合法性。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主持编撰了《中西纪事》、《华事夷言》和《四洲志》等介绍“夷情”的书籍；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写出了描绘西方世界的重要著作《海国图志》；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张之洞的《劝学篇》强调“政艺兼学”、“政尤急于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明确提出“总揽政教之权衡，博采泰西之技艺”，“中体西用”路线的勾勒，意味着儒家文化霸权地位开始丧失；严复先后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群己权界论》、《法意》、《群学肄言》等名著，为中国文人拓展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也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大量介绍西方文化。

西学这一异质文化的出场，深化了中国价值符号系统的危机。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价值理念的接受和挪用，对孔教道统的怀疑、批判和叛离，势

^① 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页。

^② 龚自珍：《尊隐》，《尊隐——龚自珍集》，康沛竹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